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中的儒学价值合理界定

庞 虎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近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正式起步的, 带有外源性的特质。儒学的复兴, 增强了中国思想界的民族底蕴, 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没有被西方文明所同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 随着时代的发展, 儒学已不能完全代表今天的中国, “儒化”也不能等同于“中国化”。目前, 一些人士过分抬高儒学的“国族意义”, 对“中国特色”进行“儒化”解读, 反而弱化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活力。当前,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立足于中国国情的主题变化, 始终与时代同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实践同步, 才能建构起经得起历史、人民和实践三重检验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关键词] 儒学; 哲学社会科学; 话语权; 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 G 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 (2023) 06-0021-07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虽然几经兴衰, 但一直是影响“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因素。当前, 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进, 儒学复兴思潮也持续高涨, 并呈现出日益明显的政治化倾向, 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地位形成了较大挑战。如何立足中国国情并摆正儒学价值, 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建构离不开儒学的复兴

从发源的语境层面来看, 近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非来自儒学传统, 而主要是“西学东渐”的“舶来”产物。早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文艺复兴运动时期, 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就高举人文主义旗帜, 反对神学, 高扬理性, 极大地提升了“以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最终使关于社会问题的学术研究从神学和自然科学的体系范畴中分离出来, 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此后,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 哲学社会科学内部的专业分类也日益完善, 最终于“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

纪初形成了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框架”^[1]。鸦片战争以后, 国人睁眼看世界, 开始向西方学习救国真理, 使方兴未艾的欧洲哲学社会科学迅速涌入中国。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时期, 一些文化精英更是直接以欧洲文艺复兴为蓝本, 让“科学”与“民主”并行不悖, 努力在近代中国复制出具有西方现代色彩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一时间新兴的学堂、期刊大量涌现。很大程度上可以说,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建立就是西学强力冲击的直接反映。在这一冲击下, 国人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情绪, “视固有学术都不成为学术”, ^[2]逐渐摒弃以往以“四部”为框架、“六艺”为基准的“中学”分类体系, 几乎完全移植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和经济学等一整套西方学科范式。这一做法对中国以后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至于今天, 仍有不少学者习惯于用西方的范式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一切学术话语, 甚至到了“不言外, 就不足以言中”的程度。

然而, 就其本质而言, 任何哲学社会科学在展现学术属性的同时, 也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性。特别是, 近代西学的传入是在中西实力悬殊的特殊

[收稿日期] 2023-10-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史论”(20FDJA001); 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儒化共产党’批判——基于建党以来‘儒化’思潮的意识形态审思”(21JDBN02YB);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意识形态制度研究”(2020XZA216)

[作者简介] 庞虎 (1978—), 男, 山东聊城人,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历史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背景下,伴随着军事入侵的淫威而实现的。受其影响,此时的东、西文化之间也就不可能存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交流对话,必然带有资本主义征服的显明烙印,其最终目的并不是促成中国的民主与富强,而是要将中国纳入由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之下,实现对中华民族的长期奴役。所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外源特性,带给中国的并不是“理所当然”地走向西式现代化强国的发展前景,相反,处理不当可能酿成历史的悲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3]。在此情况下,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了彰显价值的历史契机。儒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对“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4]4}“东方化对于西方化步步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4]9}的现状深表愤懑,发出了“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那个出头”^{[4]4}的感慨;另一位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先生,也对“五四运动以后,菲薄固有,完全西化之倾向”深感“未安”,强调民族文化要“掘发其固有宝藏,涵养其自尊自信之毅力”^[5]。在此倡导下,一大批既饱读儒家经典,又富有现代革新精神的爱国人士,纷纷汇聚在新儒家的旗帜之下,以民族救亡为使命,大力倡导“返本开新”的民族复兴之道,提出了“西学中源”“中体西用”“本位文化建设”等一系列颇有见解的救亡构想,在中国特色文化道路上进行了可贵探索,保住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虽然这些探索在今天看来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端,甚至经常被冠以“保守主义”的标签,但是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尚未取得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儒学的延续与认同给中国思想界的“西化”狂热注入了一丝稳健气息,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发挥了宝贵的平衡作用,并给远洋归来的留学人士打上了一些“本土”色彩,也给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赋予了难得的传统底蕴,极大程度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构虽然历经波折,但始终没有被西方文明所同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其自身的本质属性而言,儒学的复兴也包含着助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的基因。

首先,从儒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曾先后两次对外来文化进行吸收与转化,充分展现了“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和适应性。第一次是在宋明时期,

程颐、朱熹等人将儒学与佛教相融合,创造了博大精深宋明理学,儒学实现由官学向生活化、伦理化的转变;第二次是近代以来的现代新儒家,他们力主“引西入儒”,在捍卫儒学主体性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儒学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吸收,促进传统儒学向现代新儒学的转变。推动儒学自身的时代化,是近代以来很多新儒家人士追求的目标。熊十力曾明确指出,“中西之学,当互济不可偏废”“中西文化宜互相融合”“和之两美,离之两伤”^{[6]46}。唐君毅也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坚信“夫宇宙之道,多无一则不生,一无多则不成”^{[7]421},中西文化各有利弊,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圆而神”,西方文化的特点则是“方以智”“吾人今日必纳方于圆,以撑开此圆。”^{[7]399}到20世纪80年代,新儒家又正式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提上日程,杜维明提出:“儒学是否能够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对话,并在其中找到结合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8]他们通过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关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创见性地回应社会热点问题等方式,努力塑造儒学的现代性格。可见,在新儒家的推动下,儒学已彰显出“历久常新”的特质,主动开启了自身现代化的新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或正在形成的探索成果必能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典型的东方民族特色开辟出“中国话语”的新前景。

其次,就儒学的思想价值而言,它自身固有的一些优秀人文精神因素值得哲学社会科学界继续挖掘和阐发。儒学是以人文关怀见长的传统文化,其中关于人文智慧、价值理念和精神修养的阐述不胜枚举,例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对道德人格的追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对民本思想的弘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对“士大夫”精神的推崇等,这些精神财富不仅有助于弥补现代化进程中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崇拜所带来的人文淡化之弊,也为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发挥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功能提供有益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3]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凝结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智慧成果,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中国具体国情的历史表现,仍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言行举止。正是从这一意义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内涵，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之“中国特色”的又一重要表征。

二、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应防止“儒化”倾向

在承认儒学特殊价值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传统资源的功能发挥是有限度的过犹不及。如果过分抬高儒学的地位，就会阻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的正常进程。

近年来，关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比比皆是，关于“中国化”的论述也不胜枚举。但是，究竟“中国”的内涵什么、“中国化”将走向何方？在此类带有关键意义的问题解答上，学术界还未能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一些人过分抬高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文化在中国国族建构中的标识意义，得出了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儒家特色、“中国化”就是儒学化的论断，并在民族复兴这一时代背景的烘托下，逐渐汇聚成一股颇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潮。该思潮以倡导“儒学本位”为起点，历经“儒化西洋文化”“儒化世界文化”的演绎，到今天，又明确提出了在上层“儒化中国共产党”、在下层“儒化中国社会”的行动口号，借助网络、书刊和会议等手段积极造势，并通过儒化课堂、儒化教材等方式，向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施加影响，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化、实践化趋向，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警惕。

从表面上看，“儒化”带有“中国”的特色和某种程度的“中国化”表征，但二者的区别是深刻的，绝不能等量齐观。第一，儒学在中国化和儒化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前者，儒学仅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文化土壤，是“中国特色”的表征之一，不会决定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根本性质；而后者，儒学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已被完全纳入儒家体系的运行轨道。第二，中国不等于也不约等于儒学。得出“中国特色”就是儒家特色的学者，大多把传统文化视为“中国”的唯一标识，又进而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虽然儒家文化曾在中国国族特别是古代中国的国族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发展到今天，中国已是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

重元素为一体的复合型实体，绝非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所能概括的，儒学已不能代表今天的中国。并且，儒学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但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过程中，道家、墨家等传统文化所提供的思想资源并不比儒家少，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多于儒家，所以，也不能以儒学来涵盖整个传统文化。

事实上，作为封建“王官学”的儒家思想在近代被推翻后，就一直面临着一个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即“如何说明长期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并作为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有其存在的科学依据”^{[6][31]}。对于这一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无外乎两种回应：一是脱离具体的时空条件，将儒学放大成横贯古今中西的万能精神实体，通过儒家的“常道”和“仁心”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二是提出“返本开新”说，认为儒学传统中原本就包含了西方的科学、民主等现代思想，由儒学的精神之本，自然就能开出现代的科学与民主，“正是中国文化之道德精神求其自身之完成与升进所应有之事”^[9]。这种论断，不仅没有解决儒学所面临的生存难题，反而暴露了现代新儒家的唯心和孤傲的一面，为“儒化”思潮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就第一种做法而论，新儒家所展现出的唯心主义倾向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0]在唯物史观看来，特定的社会意识结构必然是与其所反映的特定社会经济基础紧密相连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等级制度是儒学得以生成并上升至“王官学”地位的现实基础，近代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结构的解体，中国的现实国情早已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虽然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以及儒学自身的适应性决定了儒学的影响价值仍将长期存在，但已无法找回昔日的“独尊”荣耀。新儒家人士却无视这一历史事实，不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去重估儒学的价值，而是在假定价值永恒的基础上无限夸大儒学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指导意义，最终只能沦为“美好空想”。第二种做法，实际上暴露出新儒家对其他优秀文化的怀疑态度和对儒学的自傲倾向。他们虽然提倡中学与西学的交融，但在二者的关系上却主张“西学中源”，认为西学来源于儒学。在这一思维框架下，儒学既是派生西学的母体，更是评判和取舍西学的唯一标准。其结果，

不仅失去了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自觉,而且阻碍对其他优秀文化的借鉴吸收,也就无法带来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繁荣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儒家的思维框架下,马克思主义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被纳入西学的范畴,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处理埋下了隐患。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就曾被新儒家视为外来异族学说而加以指责。新中国成立后,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仍不同程度地反对和攻击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面对当前“花果飘零”的现实境遇,深感实现政治复兴已无可能,因此主动把战线收缩到“心性儒学”的领域,很少关注和回应政治敏感话题,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形成实质威胁。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从现代新儒家中分化出的所谓“大陆新儒家”则不再甘于“心性儒学”的固守,摆出了极其强烈的政治化、实践化的进攻架势。一些人士以“春秋公羊学”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将儒学的复兴集中于“制度性焦虑”,强调“政治儒学最重礼,最重改制立法”^[11]。这里要改的制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要立的法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纲常礼法,以儒学“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12]。他们认为,当下要实现中国的“改制立法”必然要与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正面对抗,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狭隘的个人学说”,一种“偏激的意识形态”,它的传入“使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生命无处安立、精神彻底丧失的局面发展到了最高极点。”^[12]甚至攻击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西方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正在建立一种强盗舆论和强盗道德”,中国共产党早已“抛弃了工人和农民,与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结成了联盟”“不仅是‘为富不仁’,还有为政不仁”,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温情、没有道德、没有正义”,只剩下“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可持续地掠夺”和“有节制的压榨”^{[13]16}。有人还公然提出了“儒士共同体专政”和“立儒教为国教”的政治诉求,力图以“儒统”取代“马统”,把儒学重新推向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风口浪尖。

新儒家上述立场的蜕变,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张力来说无疑是一种弱化甚至倒退。首先,从国际斗争形势来看,他们关于“崇儒反马”的倡导恰恰迎合了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国进行

“和平演变”的图谋。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来,就一直是些霸权主义国家的打压对象,西方国家针对社会主义政权的暴力颠覆和思想渗透从未消停过。在西方的强力攻势下,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退出历史舞台,越南、朝鲜、古巴等国家虽然仍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但问题重重,力量微弱,不能形成抗衡西方霸权的足够力量。目前,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勃勃生机,正在以中华民族日益复兴的现实业绩不断证明着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的历史优越性,并且以逐渐壮大的经济政治文化实力抗衡着西方霸权势力的冲击,成为西方国家几经反复却始终找不到一条有效路径来复制苏东剧变历史的重要根源。也正是有了如此坚挺的实力后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不断焕发出高昂着实的话语力量,才能确保在日益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下,一些新儒家人士无视国际斗争的复杂形势,更无视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为中华民族带来的现实巨变,反而企图通过“儒化”的方式来改变当前中国的政治格局及意识形态现状,这显然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愚蠢之举。

其次,从“儒化”蜕变的源头来看,“儒化”的主张虽然表面上打着“爱国”的标识,并带有“民族主义”的特色,但骨子里却存在着变相“西化”的基因。事实上,近年来的“儒化”思潮,并非单纯发源于中国本土的儒学传统,在其兴起的时机和演进程度上都受到了海外乃至国外新儒学思潮的影响。早在20世纪80年代,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就已公开提出:“儒学在21世纪是否有生命力,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经过纽约、巴黎、东京,最后回到中国。”^[14]这样多次辗转之后又回到中国大陆的所谓“儒学”,其思想主张必然隐含了大量西方的思维范式和功能导向。受其影响,“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又进一步提出了儒学“反哺”理论,指的是新儒家起源于大陆,但发展于海外,海外的新儒家发展壮大之后必须担负起向中国大陆传播新儒家思想、带动大陆儒学复兴的历史使命。蒋庆高度评价儒学“反哺”的意义,将儒学的复兴分为4个阶段,即守先待后期、讲明正学期、传播反哺期和返乡复位期。他认为,儒学之所以能在未来的大陆实现“复位”,主要取决于海外信儒家的传播、接引和“反哺”^[12]。从

思想内容来看，“儒化”的主张也确实带有明显的西方烙印。他们公开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引入儒学体系，宣称“儒家可以容纳私有制、市场经济、精英政治”^{[13]44}。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推崇的“儒家式的市民社会”，目的就是把中国引向一条“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提出的“儒士共同体专政”，本质就是打上儒学色彩的西方精英主义政治；倡导的“立儒教为国教”，其实不过是西方宗教情怀在中国的“变种”。儒学作为中国大地土生土长的思想意识，它的兴衰演变和思想内涵还要仰外人鼻息、视西方马首是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自相矛盾并且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已明确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3]应该说，此论断有力地回应了“儒化”的喧嚣，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建构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实践才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源头活水”

与儒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具有深厚的现实根基，马克思主义最终取代儒学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是一些儒家人士所说的“西学入侵”“鹊巢鸠占”^[15]，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应有之义。

从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是以“西学东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起点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革命建设道路的过程，直接推动和成就了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话语的形成。近代初期，形形色色的主义和学说蜂拥而至，它们纷纷立言著说，扩大影响，力图在民族救亡的方案设计中谋取自己的话语地位。不可否认，在近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初创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并没有得到学界人士的普遍认同，相反，还时常遭到其他学派和势力的非议和阻挠。近代史上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唯物辩证法论战”，就包含着西化论者和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激烈论争。然而，事实胜于雄辩，随着历史的

发展，“全盘西化”和“儒学复兴”在民族救亡的角逐中败下阵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最终指明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道路，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各种主义和学说的纷争中脱颖而出，恰恰是因为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学说，而是既来自西方又超越西方的极具革命批判性的思想学说。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反动本性决定了，中国既要向西方学习又不能复制西方的老路，唯有作为“第三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应中国现实的需要，能够成为中国民族复兴崛起的指导思想。但与“儒化”和“西化”思维不同的是，赢得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因此自恃“独尊”，更没有自封为解决一切中国问题的“万能法则”，而是立足中国实际，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探索积极推动自身的中国化，并及时将中国化进程的最新成果融入中国的国情，不断以现实的成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话语”的时代内涵，进而将民族解放的历史记忆和中国崛起的未来构思内化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认知逻辑和核心价值，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思想灵魂。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舶来”主义，它早已超越了最初引入时期的救国工具范畴，对象化为日益繁荣昌盛的中国实体，是当代中国的最高内涵，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也就成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的应有之义。可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3]，是中国人民经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期探索而作出的正确选择。

此外，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身属性来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建构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首先，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真理属性和价值属性的有机统一，既是学术争鸣的主阵地，更是意识形态博弈的主战场，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哲学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变化规律的科学，必然涉及“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决定着哲学社会科学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3]，能够保障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为人

民服务”的方向健康发展。同时,哲学社会科学又是特定社会制度的产物,它的价值导向与社会制度的性质息息相关,列宁指出,“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是不可能有什么‘公正的’社会科学的”^[16]。这就决定了当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必须依托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创新探索中不断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自信。

其次,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需要主导思想的统一引领。哲学社会科学涉及学科较多,涵盖领域广泛,“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3]。由各知识领域运行规律的特殊性所决定,哲学社会科学的阵营内部表述方式各异,研究方法多样,评价标准不一,极易造成关系的混乱和话语的衰微。作为学科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并不是各个学科知识的杂乱堆积,也不是古今中外学说的无序拼接,而应该是以真理为导向的更高层次的优化组合。对真理的憧憬和追求,是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宗旨,“真理是一切真实的确立性的种子和不可缺少的前提”^[17]。我们提倡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就是要在中华民族的探索实践中去发现真理、发展真理,并在现实成效中检验真理、磨炼真理;我们建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目的也是要在百家争鸣中鉴别真理、充实真理,并在国际竞争中传播真理、捍卫真理。马克思主义作为迄今为止最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拥有科学的原则观点和立场方法,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中国思想领域的主导力量,已经或者正在显示出独特优越性。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在这一真理力量的指引下,凝聚力量,优化资源,不断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新飞跃。

当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已初具规模,话语地位也逐渐提升,但是还存在核心价值淡化、受众范围狭窄、国际竞争力不强等一系列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已暴露了马克思主义推动过程中在价值凝练、理论认同和视野演绎等层面的诸多不足,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深入发展和理论成果的创新提升才能逐步解决。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各种重大现实问题,才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成果,充实和优化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理论内涵。在当前全国人民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者更应继续传承历史使命,立足于中国国情的主题变化,一切以新时代中国的现实需要为中心,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心“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 and 有效办法上来”^[3],着力从人民群众的改革探索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用中国的创新理论来解读中国的奇迹和经验,“充分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创造、理论的独特贡献、制度的独特优势”^[18],不断推进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才能真正建构起经得起历史、人民和实践三重检验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四、结束语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历史,对文化最好的传承就是促进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推出中华文明的现代新形态。在当前新时代的语境下,中华文明已不再是儒家传统的代名词,它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实践的激发下,超越了传统时域的局限,不断融合和呈现着时代变革的荣光,无论在实质内涵还是表现形态上都实现了重大飞跃。任何墨守成规、故步自封的态度,都是对文明进步的亵渎和阻碍。

只有以文明的视野,站在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意义,才能在守正与创新的有机衔接中,充分激发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基因,提炼出颇具标识性、影响力的概念、观点和理论,赋予新时代的思想精华,形成中国特色的学术范式,推出科学有效的话语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果传播,提供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 [1] 程恩富. 中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J]. 求是, 2004 (22): 35-38.
- [2] 熊十力. 十力语要: 卷三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224.

- [3]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5-19 (001).
- [4] 梁漱溟. 中国文化的命运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
- [5] 熊十力. 十力语要初续 [M]. 上海: 上海书店, 2007: 18.
- [6] 方克立. 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8: 39.
- [7] 唐君毅. 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 [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128.
- [8] 杜维明.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28.
- [9] 唐君毅, 牟宗三, 徐复观, 张君勱.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J]. 民主评论, 1958 (1): 1-10.
-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91.
- [11] 蒋庆. 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特质、转向和发展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31.
- [12] 蒋庆. 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 [J]. 鹅湖, 1989 (170): 29-38.
- [13] 康晓光. 仁政: 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M]. 新加坡: 八方文化创作室, 2005.
- [14] 杜维明.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J]. 知识分子, 1985 (秋季号): 1-6.
- [15] 康晓光. 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 [EB/OL]. (2010-04-18) [2023-09-01]. <http://www.confuchina.com/08%20xiandaihua/kangxiaoguang/ruhua.htm>.
- [16] 列宁. 列宁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09.
- [17] 卡西勒. 启蒙哲学 [M]. 顾伟铭, 译.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11.
- [18] 刘云山. 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理论支持 [N]. 人民日报, 2013-10-20 (001).

(责任编辑: 孙永泰)

Reasonably Defining the Value of Confucian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ANG Hu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was officially start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 with obvious exogenous characteristics.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has increased the national heritage of China's ideological circle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has not been assimilated by western civi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Confucianism can no longer fully represent today's China, and "Confucianism" can not be equated with "sinicization". Some Confucians overestimate the national significance of Confucianism and "Confucianism"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weaken the discourse vitalit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At present,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ust be based on the theme change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the innovation practice of Marxism in China, so as to build a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can withstand the triple test of history, people and practice.

Key words: Confucianism;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right to speak; Chinese characteristics